

责任编辑 李 涛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上海现代文学史

主编 王文英
著者 袁 进
王文英
朱文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424,000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000

ISBN7-208-02890-7/K·696

定价 30.00 元

一道醒目的历史风景

——《上海现代文学史》序

贾植芳

二十世纪上海文学研究，过去只有过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比如“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学”、“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等，王文英同志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是第一部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上海地方文学史。但这里的所谓“地方文学”，诚如本书著者所论，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概念，而是一个开放性和历史性的概念。所谓开放性，是指本书论及的文学现象虽然都发生上海，但具体的作家、作品来源，实际的文学效用、影响等又远不仅以上海一地为限，而是具有八方辐凑、影响广泛的特征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开放气度；所谓历史性，是指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实际发生发展历程来看，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随着开埠以来的上海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出版活动中心，上海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也逐渐摆脱了地方性、区域性的狭小格局，至迟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群伦的全国文学中心，而且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即学术界通常认定的“现代文学”阶段结束，上海始终葆有了作为全国文学中心的历史和现实地位。

从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高度来分析探讨上海现代文学史，就使得这项学术成果在学术眼光的开放性、研究思路的系统性和研

究方法的扎实性等方面都具有了较为突出的特色与成就。我阅读过本书的部分重点章节,深感这是一部摆脱了多年来在封闭性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受政治功利主义支配而形成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模式,从历史实际出发,融汇了研究者自身独特的学术个性和文化品格,因而花了力气、下了功夫、做了创新,甚至还在某些方面填补了学术空白的高质量学术著作。

我与本书主编王文英同志以及本书主要作者袁进、朱文华等同志都是近些年才结识的同行朋友,我们虽然属于不同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但大约都是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历史风雨的磨难与锻炼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空内生活和工作的,我们的生命追求、人生选择,有着某些相似相近之处。所以我们能成为有来有往的同行朋友。这也就是我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冒着盛暑,写这篇称为序的小文的原因。

我认为它既为国际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增添了新的学术积累,也为我们建设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事业,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他们的劳绩与贡献是理应得到广大国内外读者和专家的感谢与敬重的。

是为序。

1998年7月中旬在上海寓所

导 言

在 20 世纪最后的十年里,中国正致力于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着力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短短的时间里,社会取得了人们一个多世纪来所梦寐而未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正充满自信地跨越 20 世纪,以全新的形象进入新的世纪。然而,类似的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业绩的辉煌,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已然发生过、存在过,因此,上海就有了值得人们刮目相看的理由,上海就具备了与当时所有的其他城市不同的价值。

在 19 世纪中叶,一场鸦片战争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延续数千年的农业封建文化遭到致命的打击,夜郎自大的天朝王国之梦被彻底击碎。这之后,中国一些具有改革和革命思想的先行者们便一直处在苦苦地探寻国家富强之路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充满着挫折和屈辱,谬误和陷阱。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当年只是一个小市镇的上海,却觅得了一个天赐的机遇。1832 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派出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和郭士立(Charles Gutzeaff)乘阿美士德(Amherst)号轮对我国东南沿海侦察,他们的结论是:“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①英国商人

^①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 年版。

以现代经济的眼光发现了上海的特殊价值。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等。根据这些条约，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实行开放。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颁布，宣布英租界的辟设。此后，法租界、美租界也相继划定。租界，这个西方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历史产物，一个充满着屈辱感的历史性名词，除了侵略者的掠夺性内涵之外，却还充当了另一重历史角色，即把上海引向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的历史角色，这大约是当初的侵略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吧。自从上海产生租界之后，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未可估量的变化。

租界是封建王国中的一块“飞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在政治上，租界里设立了“工部局”、“公董局”（市政府）；“公审会堂”（法院）；“商团”（民兵）；“巡捕房”（警察局）；“救火会”（消防队）等机构，这是从西方搬来的一套政府机构，一套西式的国家机器。这些机构不是靠政府拨款维持，而是按照欧洲城市规则，靠纳税人的税收运转。因此，原有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军阀政权，他们的势力都不得进入租界。从小刀会起义到“四一二”政变，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和上海商团，就没有一次让政府军队进入租界。在经济上，租界的作用是令人惊奇的。外国人以租界为基地展开了对中国的贸易往来。他们运来大量洋货，经由上海租界发往全国各地，同时将全国各地的土货集中运向上海，再由上海销向海外，上海成为全国进出口货物的集散中心、商贸枢纽。租界展开了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使上海的经济进入到世界经济循环的轨道之中，这完全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格局。在这种世界经济轨道的循环中，上海这块土地像被施了魔法似的，涌现出巨大的生产力。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交通通讯中心、工业中心，并一跃而成为远东第

一大都市、东方第一大港。在文化方面，上海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且较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变化更复杂。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既有融合，又有冲撞，所以在 20 世纪初的上海文化显得相当混乱，所谓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有西方旅游者称之为：“表面上的西化，内里中国精神”(Chinese spirit inside with Westernized out Looking)；中国人自己称为：“西方的制度，中国的文化。”西方文明与中国精神，如油和水一样混合，油浮其上，而内里还是坚实的中国文化的核。文化上的变化略滞后于政治、经济上的变化，但变化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中，经济是决定性的，由于上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此上海的政治和文化也必然地发生或深或浅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受到决定性的制约和影响。随着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海的文化和现代文学也逐渐地摆脱地方性、区域性文化和文学的格局，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上海的现代文学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成为领袖群伦的全国的中心文学。

20 年代初，全国文化的中心仍在北京，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网罗了全国多数的文化精英，北京得以依然保持着在文化学术领域的王者地位。上海只是作为它的接受和响应的角色而出现。然而，即使如此，上海也已经具备了其他城市，包括位于文化中心的北京所不具备的优势条件，那就是上海具有强大厚实经济实力，具备了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产业。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办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刊物，如《新潮》、《语丝》等。《新潮》开始时得到北大校方的经费资助，但到 20 年代初，北大经费拮据，不再资助《新潮》，杂志不得不停办。《语丝》是由教授、学生自掏腰包自办印刷发行的，由于他们的资金有限，发行的网络也在较小的圈子里，因此杂志的影响自然受到相当的限制。而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由于得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局面便大不相同

了。《小说月报》的编辑人员，如茅盾、郑振铎等都有商务印书馆发给的优厚薪金，这一事实不仅仅说明了《小说月报》的编辑们有经济保障而全力投入编辑工作，而且还表明了知识分子除了皇粮之外，有了单靠自己的知识可以安身立命的另外的立足之点，这就是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文化产业的经济据点。《小说月报》依托商务印书馆的发达的发行网络，产生出巨大的影响，这个刊物自1921年改版后，一直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新文学刊物。并且，《小说月报》维持的时间也相对长些，一直到1932年1月28日，上海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它才停刊。由于上海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三个新文化、新文学方面的刊物——《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都在上海出版、发行。也许可以说，当时在北京的新文化、新文学方面的能量，在依靠了或结合了上海的文化、新闻等文化产业的经济优势之后，才得以向全国以较大的幅度推广和释放。因此，在20年代，上海虽然作为接受北京文化中心的辐射的附属地域，但却是一个特殊的不可或缺的附属性城市。也正因为，上海的经济优势对文化的支持作用越来越强大，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上海逐渐地取代了北京的地位，而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文化、文学的中心。

30年代，上海在经济上的优势显而易见，而政治上的优势亦日渐突出。上海的租界作为旧中国国土上的“飞地”，它实行的是另一套规则，因此，在两种不同的政治统治之间往往显露出某些很有意味的政治空隙，如政治活动的相对宽松，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等，这些条件常为各派政治力量所利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优势叠加起来，上海这个城市便显现出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凝聚力，正是这种内在的凝聚力，使上海在文化方面的中心地位迅速形成和得以确立。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一经确立，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展现出领袖群伦的特征，第一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海，展现出大海般的气派。从20年代末起，各路文豪，大量的知识精英不约而同

地向上海集结。向上海集结的精英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从北京南下而来的；从北伐前线退回上海的；从国外（主要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从东北沦陷区及四川、湖南等地区来到上海的。其中以从北京南下而来的最富有象征意义。北京在“五四”运动期间，是我国新文化的发祥地，因此也是我国新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但在1927年前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处于崩溃前夕，经济方面极度匮乏，而政治方面却加紧了压迫，一次次地制造血腥惨案，于是大批知识分子被迫离京，北京的文化中心的地位随之流失，当他们重新在上海汇合的时候，上海的文化中心的面目也就随之凸现出来。鲁迅是较早离京的一个，他于1926年8月离京，辗转厦门、广州，1927年9月来到上海。此外，当时在京的《现代评论》和《新月》社的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饶孟侃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也是这时到达上海的。还有在京为《晨报》写稿的沈从文，为京报编《民众文艺》的胡也频、丁玲也南下上海。从北伐前线退回上海的有郭沫若、沈雁冰、蒋光慈、阿英、孟超等。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有沈端先、李初梨、成仿吾等。从东北沦陷区来上海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从四川来的有沙汀、艾芜等，还有从湖南来的叶紫等。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文学英才汇聚申城，在上海文坛上竞相争艳。上海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样式共存于上海。我们若从政治角度着眼，那末当时的上海文坛有左翼的革命文学，有反动的与之相对立的民族主义文学，有中间偏左的民主主义文学，有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文学。我们若从地区着眼，那末上海有反映东北沦陷区的文学，有展现西南边陲色彩的湘西文学，有展现四川面貌的蜀地文学，有反映农民运动的湖南文学，更有看不起海派的京派文学等等。我们若从文学的雅俗着眼，那末上海既有探索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的主流文学，也有追求艺术品位的唯艺术文学，也还有供市民休闲消遣的通俗文学。我们若从中西文化交汇的角度着眼，那末上

海既有传统的本土的种种文学,也有深受外来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等等。可以说,全国有的文学,上海几乎都有,而且应该反过来观照,往往在上海首先出现了某些文学流派和样式,再向全国各地传播、扩散。第二个领袖群伦的特点是更加内在的,第一个特点是在量上:量大,量多,而第二个特点在质上,是质的优秀和杰出。由于申城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他们创办了全国一流的出版机构,创办了全国一流的报刊杂志,同时他们也就具备了吸引和汇聚全国第一流的创作成果的能力,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把全国最好的、最杰出的作品吸引到上海来发表。上海文化中心的地位赋予了上海文坛以某种无形的权力,这种无形的权力在戏剧、绘画的领域中表现得相当充分。中国的京剧由南派而成为海派,中国绘画由南宗而衍化为海上画派。不论哪个剧种,哪宗画派,不论哪个演员,哪位画家,要想在全国打响,必须在上海首先打响,要想获得全国的承认,必须首先获得上海的承认。其时在上海的文坛上情形也正是如此。茅盾的巨作《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日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等,一时间上海文坛花团锦簇,佳作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上海文坛上,怕不会是偶然的吧。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打断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原有进程。1937年11月,上海失守,租界作为沦陷区的孤岛尚保存有某些优秀文学力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租界消失,上海整个城市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由于战争,上海的企业大量内迁,上海的文化人士亦纷纷内移,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明显流失,因此,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在逐渐地流失。但是由于经济、文化方面的基础尚在,40年代上海现代文学还有两个重要方面的收获:一是巴金、钱钟书一类作家的优秀创作,二是作为上海土生土长的市民通俗文学也还得到了相对的成长,

并且因为有张爱玲等作家的出现而将市民小说的文化素质提高到相当雅致的高度，成为上海现代文学中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的风景。

作为全国中心的上海文坛，她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全国各种类别的文学群体，各种风格样式的文学流派。作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上海，她还为全国文坛贡献出了她的特殊类型的文学，盛行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和兴起于30年代的新感觉派文学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类。鸳鸯蝴蝶派文学，产生于上海的市民社会。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上，其他类型的文学大都可以从政治角度去加以归纳，唯独鸳鸯蝴蝶派文学，似乎只能从经济角度才能切入，它是紧紧地植根于近现代上海经济发展的土壤之中的一种文学。30年代兴起的新感觉派文学，我们把它归在现代主义文学这一类别中，是因为它受到海外新感觉主义文学的某些影响。但正是这种文学才表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某些方面，才具有与上海的某种血缘似的关系，有了这种文学，才可以说我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因此，要理解这两类文学，如果离开上海近现代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比较准确地理解了这两类文学，那末也就是理解了近现代上海这座城市的某些特质。

考察了现代文化、现代文学中心的形成和聚散，我们就有了可能对我们这本著作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加以界定和廓清的基础。在上海现代文学的整体观照中，带有前提性的概念是：何谓上海文学？何谓上海作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上海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那么上海文学就是发生上海这个地域之内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等等。那么上海作家呢？根据一般的原则，是指上海籍的作家。然而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上海文学不仅仅是由上海的作家创造的，或者说上海文学的绝大部分不是由上海作家创造，而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地作家创

造的。若按照一般的地域文学史去看，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但上海就是这样特殊的城市，上海的文学是由全国各地的作家共同创造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上海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20世纪初逐步树立了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方面的中心地位之后，她的内在的活力是别的城市无法相比的。于是上海成了一个非凡的大海，大海有大海的魂魄，有大海的气度，她的容纳量和凝聚力真是非同寻常。作为一个城市，她是一个大量移民的城市，作为一个文坛，她也是一个大量流动的移民作家的文坛。在这个文坛上，不断地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的身影，他们或者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生活和工作；他们或者在全国众多的地点和城市之间进行选择，最后选择了上海作为他的创作据点；他们或者从海外归国之后并不回到故乡而居留在上海，等等。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由外地作家而变成上海作家，比如鲁迅、茅盾、巴金等。浙江的文学史可以把鲁迅、茅盾归入他们的文学史，但本质上鲁迅和茅盾更应该是上海的。另外，还有一类作家，他们不是上海人，也没有在上海工作过和生活过，但是他们的相当数量的作品在上海文坛上发表、出版，或者他们的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品是在上海发表的，他们的主要文学成就落实在上海，他们的文学影响也在上海生发开去，他们的创作成果是上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类的作家，当然不能把他们归入上海作家之列，但是他们的创作却实在是属上海文学的范围之内的。这样一类作家有老舍、沈从文、周作人、曹禺等。于是我们看到，上海作家和上海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也不像在一般性的地域性文学史中那样可以划等号，而是上海作家可以由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来补充、来变成，这是一重意义上的容纳和扩充；另外一层是全国的作家把他们最好的作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上海，使上海文学不断地得到扩充，不断地壮大，使上海文坛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海，一个充满生生不息的活力的大海。所以上海文学是一个容纳百川的大海文学，它的

内涵和外延大大地大于上海作家。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上海的现代文学曾经有过她的辉煌,但同时却不能不看到她还存在的诸多遗憾。20世纪初,上海社会在外力的压迫下发生着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她在经济上一度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当全国尚处于小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时,上海的处境绝对是尴尬的。她的进展过程充满着各种矛盾的纠结,如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等。对于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经济体制变化的性质,国内大多数人士都不能有清醒正确的理解,连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未能例外。上海的经济奇迹似乎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奇迹,仅仅是一种畸形的殖民化怪胎。诚然,在上海城市的发展中,有相当多的外来势力推动的因素,但是,在她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上海人(包括外地移民而来的),适应历史的时势,抓住历史良机,顺势而为,学得了西方文化的真髓而化为自己的血肉,推动了上海历史的进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知道,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毕竟是极少数,上海的经济奇迹是依靠大多数上海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工业、商贸、金融等领域中,华资的成分越来越大,其上升的势头也不容低估,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精英文化层的观念不能与时代前进同步,他们或者饱含民族屈辱感情而拒绝认同事实,或者面对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而无所适从,因而对上海发展过程中的最实质的部分——转向现代化——无法认识,因此上海在产生出经济奇迹的同时,却并不能同步地产生出上海的、中国的具有新质的文化精神来。这是时代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化的遗憾。而这类遗憾同样地浓浓淡淡地遗留在上海现代文学中。

时至20世纪之末,整个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这种迈进是在人们认识到了时代的趋势之后,采取的主动进攻的行动。所以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看上半个世纪上海走过的历程,以及这个历程

在文学上表现的印记,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当然,由于我们功力不足,再加上我们所作的事还没有其他人做过,因此难免有许多不当乃至谬误之处,希望就正于各路方家。

1997. 10. 12. 于上海

目 录

一道醒目的历史风景

——《上海现代文学史》序	贾植芳 1
导言	1

第一编 20年代(1917—1927)

第一章 城市与文学	3
第一节 城市的发展与文化环境	3
第二节 革命基地	9
第三节 文化中心的北移与南下	12
第四节 文学的状况与特点	20
第二章 人生派文学	27
第一节 为人生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会	27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兴起	33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理论	42
第四节 问题小说	48
第五节 鲁迅的创作	53
第六节 叶绍钧的创作	58
第七节 其他创作及影响	62
第八节 无产阶级文学	67
第三章 浪漫派文学	73
第一节 浪漫主义的背景	73
第二节 创造社及其宗旨	79

第三节	郭沫若的创作	87
第四节	郁达夫的创作	92
第五节	创造的集体	97
第六节	浪漫主义的衰落	104
第四章	现代主义及其他	110
第一节	现代主义的萌芽	110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创作及其他	115
第五章	通俗文学	127
第一节	从雅到俗	127
第二节	市民的梦	135

第二编 30年代(1928—1937)

第六章	30年代的上海	147
第一节	政治、经济中心	147
第二节	文化中心	149
第三节	政治、经济、文化——内在的关联和紧张	152
第四节	上海30年代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 继承、分化和发展	155
第七章	“左翼”文学	158
第一节	社会背景	158
第二节	“左翼”文学的理论导向	167
第三节	鲁迅的创作	194
第四节	茅盾的创作	203
第五节	左联初期的创作	217
第六节	柔石、丁玲、张天翼的创作	223
第七节	萧军、萧红的创作——东北作家群加盟 上海左联	229

第八节	沙汀、艾芜的创作——四川乡土作家群	
	加盟上海左联·····	233
第九节	叶紫的创作——湖南作家加盟上海左联·····	240
第十节	“左联”时期的诗歌与散文·····	242
第十一节	“左联”时期的戏剧与电影·····	248
第十二节	左联文学的对立面——“民族主义”文学·····	263
第八章	“民主主义”文学·····	265
第一节	“民主主义”派·····	265
第二节	巴金的创作·····	267
第三节	老舍的创作在上海·····	281
第四节	曹禺的创作在上海·····	297
第五节	其他“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	307
第九章	“自由主义”文学·····	311
第一节	“自由主义”派·····	311
第二节	后期“现代评论”派、后期“新月”派的 理论和创作·····	312
第三节	京派的理论和创作·····	320
第四节	“论语”派·····	340
第五节	“自由人”、“第三种人”·····	342
第十章	现代主义文学·····	345
第一节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文学与思潮·····	345
第二节	象征主义派文学与思潮·····	352
第三节	新感觉派文学与思潮·····	355
第十一章	通俗文学·····	377
第一节	关于通俗文学·····	377
第二节	张恨水和《啼笑因缘》·····	381
第三节	国难小说·····	386
第四节	其他通俗文学·····	390